

對「延安道路」的再審視

——評侯天嵐《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和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 葉 靜



侯天嵐：《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紐約：柯捷出版社，2010）。

延安是抗日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核心，「延安道路」常常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建國後出現的政治波動其實是中共對「延安道路」的歸復。比如勞倫斯 (Alan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Lawrance) 認為大躍進的發動，是因為以城市為導向的蘇聯模式與中共在農村的發展經驗並不匹配，毛澤東對第一個五年計劃不滿，他肯定「延安道路」，認為要「兩條腿走路」，發展「兩個積極性」，所以在

延安是抗日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核心，「延安道路」常常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建國後出現的政治波動其實是中共對「延安道路」的歸復。賽爾登認為「延安道路」的特徵是：公共參與、分權化和社區權力。

對歷史細節的仔細考察，有利於對「延安道路」進行重新審視，也有利於理解抗日時期邊區政治對中國建國後政治的真正影響。《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從財政角度以詳細的歷史資料描繪了陝甘寧地區的發展，無疑更新了對「延安道路」的一般理解。

1958年之後以大躍進的方式來推進建設^①。而文革則代表了對「延安道路」更大程度的回歸，格雷 (Jack Gray) 認為文革的發動常常被看成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群眾路線與劉少奇為代表的精英路線的衝突：毛強調群眾意識和地方自主性，要求建立適合農村需要的學校等，而劉的路線正相反^②。鄒讜也認為，毛厭惡主導和服從，希望延續延安精神，而劉以黨官僚組織為重，倚重物質獎勵，兩者之間出現了矛盾^③。

那麼，究竟甚麼是「延安道路」？賽爾登 (Mark Selden) 認為「延安道路」形成於1940年代初期，在國民黨封鎖和日本軍事威脅之下，中共開展了整風運動，轉變其社會經濟的組織模式，形成了「延安道路」，其特徵是：公共參與、分權化和社區權力^④。「延安道路」歸根到底就是貫徹群眾路線，使領導和群眾緊密接觸^⑤，通過這種組織方式來實現自給自足。因此，「延安道路」常被認為與蘇聯模式有着很大的區別，它不同於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功能分化、等級制、命令主導的方法^⑥。總體而言，「延安道路」是中共在抗日根據地發展出來的、獨特的生產組織模式。

然而，「延安道路」是學者對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歷史抽象和歸納後的產物，陝甘寧邊區的發展實際上是動態和多元的。對歷史細節的仔細考察，有利於對「延安道路」進行重新審視，從而也有利於理解抗日時期邊區政治對中國建國後政治的真正影響。侯天嵐的《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以下簡稱《財政史》，引用只註書名和頁碼)

從財政角度以詳細的歷史資料描繪了陝甘寧地區的發展。它雖然是一本史料型的著作，但是作者對陝甘寧邊區財政史的認真考察，無疑更新了對「延安道路」的一般理解。

侯天嵐首先介紹了陝甘寧邊區特殊的自然狀況：陝甘寧邊區包括陝西省北部、甘肅省東部以及寧夏省東部，是抗日期間中共中央所在地。這片地區處在西北黃土高原的中北部，氣候惡劣，農業和副業都極為落後。這種落後的經濟顯然無法滿足中共的財政需求：「由於地廣人稀，經濟落後，人民貧窮，負擔就不可能過重；另一方面是共產黨中央所在地，是培養幹部與儲存幹部的基地，脫產人員在總人口中必佔相當大的比重。」(《財政史》，頁6) 中共中央一方面必須滿足自己的財政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能對社會過多汲取從而引起社會不滿。怎麼辦？

要維持正常運作，陝甘寧邊區政府只有兩種選擇，第一是靠外部資源輸入；第二是靠內部汲取和生產。侯天嵐劃分的兩個階段恰好代表了這兩種模式。第一個階段是1937至1940年，這個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抗日，國民黨向共產黨發放抗日經費：「中共中央系統、軍事系統的財政開支完全依靠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抗日經費和國內外民主人士的捐贈款解決。邊區系統的財政收入，是徵收稅目很小、稅率很低的貨物稅。」(《財政史》，頁8) 從比例上來看，地方收入的比例在1938年僅為所有收入的8%，1939年佔9%，以及1940年的17% (《財政史》，頁33-34)。因此，在第一個階段，國民黨的抗日經費

和外部援助極大地緩解了中共中央的財政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邊區政府不需要向該區民眾大量汲取財政資源，有利於其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

既然不需要大量財政徵收，那麼大規模的政府組織建設也並不是很必要。以稅收機構為例，陝甘寧邊區雖然在1937年就建設了財政機構，但工作制度並不健全：「由於財政收入依靠外援，稅局只有定邊和張家畔兩局，出口貨物徵稅只限於三邊、隴東地區。鬥傭、煙酒入境稅、特種貨物過境稅則由縣二科代收，而且尚未制訂正式的稅收條例。」（《財政史》，頁24）這與「租金國家」的邏輯類似：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部資源輸入，比如援助和外資，那麼它就不需要向國內社會大量地汲取財政資源，因此也不需要形成龐大的政府機構⑦。

不過，情況很快就改變了。隨着抗日進入持久戰階段，國共合作發生動搖，國民黨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如何限制並消滅共產黨的問題上，並最終出現了1941年國民黨圍攻新四軍的「皖南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從此，國民黨派大軍包圍並封鎖陝甘寧邊區，同時取消每月發給八路軍的抗日經費。此外，受1940年「百團大戰」衝擊的日本也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抗日邊區。因此在第二階段，即1941至1945年，邊區黨政機關無法再延續之前的財政獲得方式：隨着國民黨外部援助的減少，陝甘寧邊區政府迅速加大了對該地區的財政徵收，很快建立了稅務總局及各縣

徵收局。然而，該地本來就落後的經濟無法承受過多的財政徵收，否則只會引起民眾強烈的反感和不滿。因此，加大力量組織生產和擴大貿易，便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理性選擇。

經濟如此落後，如何促進生產和擴大貿易？格申克隆 (Alexander Gerschenkron) 指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經濟愈是落後，其發展愈需要依靠強組織力，即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來提供資金和促進生產⑧。陝甘寧邊區的發展過程正好驗證了這個發展邏輯。當時中共中央規定「努力從事集體的有效的生產，發展公營企業，作民眾的模範與指導」（《財政史》，頁86）。在這種發展戰略下，1940年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成立了設計委員會，制訂了發展計劃，公營企業不斷發展。比如到1942年，公營企業已經能實現肥皂的完全自給，石油生產保證了無線電台和機器工廠的用油，甚至實現了某些產品外銷（《財政史》，頁105-106）。中央為了進一步集中使之更好發展，還將財政經濟處改組為中央管理局，將中央直屬系統的二十七個廠統歸中央管理局管理（《財政史》，頁97）。

在農業方面，互助生產和合作社生產模式大量發展。1930年代，雖然中共也組織農民搞合作社，但是由於常常是命令的方式，由政府層層攤派下去，脫離群眾，不進行分紅，使民眾十分不滿。1940年代之後，尤其是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之後，強調中共領導要尊重群眾，滿足群眾需求，走群眾路線（《財政史》，頁314）。南區合作社的經驗

隨着國民黨外部援助的減少，陝甘寧邊區政府迅速加大了對該地區的財政徵收，然而，該地本來就落後的經濟無法承受過多的財政徵收，否則只會引起民眾強烈的反感和不滿。因此，加大力量組織生產和擴大貿易，便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理性選擇。

「延安道路」實際上只是特殊環境的產物，是一種極端模式。因為陝甘寧邊區存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擁有龐大的脫產人員，是一個條件很特殊的地區，不能代表中國其他根據地的狀況，更不同於當時其他自然條件更加優越和工業生產更有基礎的非根據地地區。

被推廣。這大大地使政府—民眾關係得到改善，兩者緊密合作，邊區政府也從這種合作關係中獲得了很大的支持。

中共工作方式發生改變，這與外部壓力有關。要動員農民並非是簡單的事情，因為農民一般比較保守，對經濟剝削的回應緩慢而勉強，他們更多是防守型而非革命型的^⑩。因此對經濟條件改善的訴諸並不能必然地動員農民，而外部威脅卻常常能更加有效地動員農民。這也正是為甚麼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之後，中共能比起之前更加有效動員農民的原因^⑪。而中共在1940年代初期比1930年代後半期能更加有效地動員農民，恐怕與1930年代末以來更加嚴重的外部壓力不無關係。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共已經

比之前任何一個時期更能滲入中國的社會。它將戰爭和工作結合起來，滲透入自然村，這可以說是延安時期中共最大的成就^⑫。

然而，這種最大程度動員群眾的生產方式卻並不是陝甘寧邊區1940年代以來獲得財政資源的主要方式，畢竟，陝甘寧邊區自然條件惡劣，自給自足生產提供的只是有限的生活費。邊區仍然仰仗於外部大量物資的進口，這就需要大量的出口來解決財政缺口問題。根據侯天嵐的考察，雖然當地農業種植並不理想，但是食鹽產量豐富，可供出口。然而，其收入比較有限，因此陝甘寧邊區財政的重要支柱是特貨的種植和貿易^⑬。「在財政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陝甘寧邊區政府於1942年種植特貨，開始是三五九旅



延安機關幹部在紡線，實現自給自足。

在南泥灣種植，然後號召老百姓種植。」(《財政史》，頁140) 特貨的種植和出口為邊區換回了大量的財政收入，以1943年為例，當年陝甘寧邊區總出口收入為536,184萬元，而特貨出口的收入為368,325萬元，佔68.66% (《財政史》，頁354)。1944年特貨專賣之後，財政收入更是大大增加，而且還實現了出超，所以特貨是1940年代陝甘寧邊區財政的主要支柱 (《財政史》，頁474)。

如果中共要從陝甘寧邊區財政歷史中獲得甚麼經驗的話，恐怕並不是所謂的自給自足、權力下放、緊密聯繫群眾的「延安道路」，因為正如侯天嵐分析的那樣，這種生產組織方式並不是滿足中共財政需求的主要方式，它只是在很小程度上發揮了補貼財政的作用。不僅如此，「延安道路」實際上只是特殊環境的產物，是一種極端模式。因為陝甘寧邊區存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擁有龐大的脫產人員，是一個條件很特殊的地區，不能代表中國其他根據地的狀況，更不同於當時其他自然條件更加優越和工業生產更有基礎的非根據地地區^⑩。

再次，陝甘寧邊區內部也存在地區性的差異。比如學者紀保寧 (Pauline B. Keating) 指出，「延安道路」僅是延屬地區的模式，受當地情況很大影響，因為這個地方土地多，新移民多，另外社會分層不嚴重，所以延安強調大眾民主；而綏德地區則是土地少，鄉紳發揮的作用大，因此黨更顯現出權威主義的一面。所以無論是權威還是民主，都更多來自於那個地方的生態和社會結構，而更少地來自政黨的意識形態^⑪。

總而言之，「延安道路」本身在中共財政需求中的邊緣地位、陝甘寧地區的特殊性以及邊區內在的多樣性，都說明「延安道路」只是適用於具體環境的一種特定生產模式。那麼，為甚麼如此特定的「延安道路」常常被看成是代替蘇聯模式的一種生產模式？為甚麼「延安道路」常常被認為影響了中共建國後的政治發展呢？或許更可信的是，「延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鬥爭作用下的組織模式，而不是更有效率的、可以與蘇聯模式相抗衡的生產模式。當性質相似的政治鬥爭出現時，類似於「延安道路」的一些做法便出現在中國大地上。

這就需要考察「延安道路」形成過程中特定的政治背景，即整風運動。「延安道路」不僅僅是中共在外部軍事壓力和經濟封鎖下的自然形成的產物，它的形成還與中共黨內權力鬥爭密不可分。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引用只註書名和頁碼) 詳細地梳理和描述了中共內部從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開始至延安整風結束的人事關係與內部鬥爭，將延安整風運動放入高層領導人的鬥爭框架中進行描述^⑫。毛澤東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得到了黨內大多數領導的支持，其政治影響力不斷增加，但當時毛的權威更多的還是在軍事意義上，最高政治權力的獲得是在王明1937年到達延安後才實現的^⑬。

高華認為，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基本達到中共最高領袖的地位，而他在1940年代初期發動整風運動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自

「延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鬥爭作用下的組織模式，而不是更有效率的、可以與蘇聯模式相抗衡的生產模式。當性質相似的政治鬥爭出現時，類似於「延安道路」的一些做法便出現在中國大地上。

在高華看來，毛澤東是一個極為現實的人，絕不是對群眾路線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領導人。這種觀點無疑為重新審視「延安道路」提供了新的視角：形成於整風時期的「延安道路」，表面雖然是生產方式，但更多體現的是政治邏輯。

已在黨內的基礎（《紅太陽》，頁302-303）。在高華看來，毛是一個極為現實的人，絕不是對群眾路線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領導人：

從本質上說，毛澤東是中共等級差序制度的最大維護者，而當他的權力還未達到頂峰，或自感權力受到威脅時，毛往往又變成一個「反官僚主義」的急先鋒，只有在這時，毛才會釋放一些頭腦中的「虛無主義」，換上一付「小人物」保護者的面孔，然後煽動下層「反特權」，驅趕群眾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一俟目標實現或情況有變，毛則馬上翻臉，挑出幾個「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無政府主義」，將那些被愚弄的群眾和知識份子一網打盡。（《紅太陽》，頁329）

高華這種觀點無疑為重新審視「延安道路」提供了新的視角：形成於整風時期的「延安道路」，表面雖然是生產方式，但更多體現的是政治邏輯。以分權化為例，當時，從蘇聯歸來的知識份子以及從國統區大量湧入的知識份子，充斥了陝甘寧地區的黨政機關中高層^①。他們憑藉自己的知識以及工作經驗，擁有一定的自主性。比如，在1942年之前，金融、教育等政府部門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權來實現其專業化職能。在這種垂直領導下，少有來自政黨和其他部門的監督^②。這對於毛澤東而言，無疑是一個潛在的權力挑戰。整風運動中的精兵簡政，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削減這部分中高層的組織和人員，以徹底實現毛控制日益龐大組織的目的^③。因此，

精兵簡政表面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同時精簡軍政，但實際上主要目的是針對政府機關，而且只是下放幹部，將縱向領導變成橫向領導，而人員從總體上並沒有減少^④。在這個過程中，以毛為首的黨的權力大大擴張。

以這種政治鬥爭的邏輯來觀察中共建國後的政治發展，能夠更好地理解「延安道路」兩次出現（即大躍進和文革）的原因。這兩次波動在根本上都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權力潛在挑戰者（往往是具體負責經濟事務、擁有一定決策自主性的高層領導）的控制。比如大躍進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毛對經濟官僚的一個反擊，專門負責經濟事務的高層幹部在1956年對毛1955年下半年加快農業合作社建設速度進行過抵制^⑤。毛通過分權、發動群眾運動、強調政治忠誠等方式來獲得地方支持，從而徹底擺脫中央層面經濟幹部施加的限制，並削弱他們的權力^⑥。

而文革的發動，是毛澤東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最高決策權：自大躍進遭遇困難之後，毛將恢復經濟的重任交給了劉少奇，自己退居二線。隨着接觸第一線工作的增多，劉少奇不再是大躍進的一個支持者，相反，他的政策和判斷不斷偏離了毛的偏好，在客觀上挑戰了毛的權威^⑦。這是毛無法忍受的，而文革就是高層的權力鬥爭，它使得「延安道路」的若干要素再一次出現在中國。

因此，只有當把「延安道路」理解成高層權力鬥爭下的一種政治模式，而不是一種更有效率的生產模

式時，才能真正理解「延安道路」在建國後中國政治中的屢次「再現」。建國後類似於「延安道路」的組織模式的出現，並非是中共經驗的一種自然歷史延續，因為中共建國前的經驗是多元的。另外，中共建國後面臨的經濟建設任務更多集中在城市而非農村，情況與建國前完全不同，之前的經驗並沒有自動延續和恢復的理由。「延安道路」的再現實際上取決於中共高層政治權力鬥爭的程度。當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主持生產的高層幹部不滿程度大大提高而出現激烈權力鬥爭時，延安時期出現的分權化、講求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對知識份子的批判、對思想意識的改造等要素又都重新出現在中國政治之中。

註釋

- ① Alan Lawrance, *China under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2-33, 57.
- ② Jack Gray, "The Two Roads: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ssays by a European Study Group*, ed. Stuart R. Sch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09-57.
- ③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8 (1969): 63-91.
- ④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 ⑤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introduction to *New Pers-*

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xv.

⑥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 50-51.

⑦ Todd Moss, Gunilla Petterss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An Aid-Institutions Paradox? A Review Essay on Aid Dependency and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no. 74, January 2006,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ww.cgdev.org/content/publications/detail/5646.

⑧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⑨ Lucien Bianco, "Peasant Responses to CCP Mobilization Policies, 1937-1945",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175-88.

⑩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⑪ 參見 Franz Schu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⑫ 特貨的重要性也為其他學者指出，參見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263-98。

⑬ 賽爾登在1995年著作的後續中，也論及了陝甘寧地區的特殊性：1、在最窮的邊區；2、先完成了土地分配；3、大部分地區沒有受到日本侵略，游擊戰爭並沒

只有當把「延安道路」理解成高層權力鬥爭下的一種政治模式，而不是一種更有效率的生產模式時，才能真正理解「延安道路」在建國後中國政治中的屢次「再現」。「延安道路」的再現實際上取決於中共高層政治權力鬥爭的程度。

有發揮很大的作用；4、是中央黨軍的所在地，吸收了上千的知識份子。可以參見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223。

⑭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⑮ 下面這篇書評較好地歸納了高華的觀點。參見Kan Liang, "The Rise of Mao and His Cultural Legacy: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issue 34 (2003): 225-28。

⑯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339-87.

⑰ 下面這本書講述1935年12月9日學生運動的這部分年輕知識份子的歷程，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去了延安，在延安官僚機構中任職，在整風運動中被下放地方。參見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另據張遠新介紹，知識份子奔向延安的潮流，形成於1930年代中期，1938至1939年間進入高潮。至1940年代初期，延安聚集了約4萬人規模的知識份子群體。據1939年11月統計，黨政中級幹部中，有85%是知識份子。參見張遠新：〈論延安知識份子群體的歷史作用〉，《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67-76。

⑱ 這點也為賽爾登指出，參見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chap. 6。

⑲ 宋金壽也認為整風運動主要是針對高中級幹部的，但是他認為知識份子的小資產經濟思想使其成為運動對象。他並沒有注意

到中高級幹部和知識份子的重合之處。宋金壽：〈延安整風方向和目標的發展與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9期，頁81-91。

⑳ Stuart R. Schram,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32.

㉑ 據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介紹，「在1956年間的場合，尤其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周恩來〕的主管各經濟部門的副手們，明顯表示了對冒進的抵制，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使他們能最有效地估計冒進帶來的影響。他們中的重要人物包括：陳雲，副總理，政治局五人內部圈子裏的一員；李富春，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先念，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鄧子恢，副總理兼國務院農業辦公室主任；薄一波，國家經委主任；王首道，國務院交通運輸辦公室主任。」參見麥克法夸爾著，魏海生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頁104。

㉒ 具體過程可以參見Alfred L. Chan, *Mao's Crusade: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㉓ 據高華介紹，劉少奇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劉少奇全力支持毛澤東。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之後，劉少奇卻不得不每天面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他的心情日益沉重。參見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183-84。

葉 靜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芝加哥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